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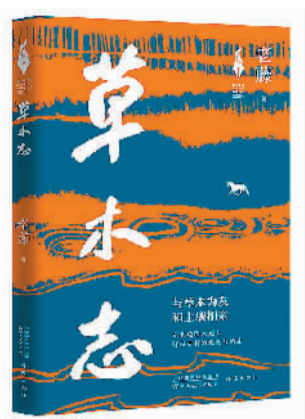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谈

以草木喻人书写乡村变迁

老藤



老藤近照


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有这样一句：“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，岂理美之能当？”大概意思是连草木都分辨不得，更谈不上去鉴赏美玉了。这是屈原的自谦，屈原喜欢以香草喻君子美德，他对草木的认识是深刻而独到的。《离骚》中写了许多香草，如江离、芷、蕙、兰、留夷、揭车、杜衡、菊、荃等10余种。了解如此多的品种，对今天的作家来说是极高的挑战。学习《离骚》时，为了弄清诗中的香草，我一遍遍查阅资料，虽然辛苦一些，但也甚感乐在其中。

我对草木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，这大概与我在北大荒的湿地边生活过有关。湿地是植物的王国，一个人只要少年时在湿地周边生活过，草木和繁花就会成为记忆的底色，每每见到绿植，我就会像邂逅故友一般心情愉悦。我有个习惯，见到陌生的草木总会刨根问底弄个明白，手机里拍照识草木的软件利用率极高。只要有时间，对那些熟悉的草木，我也喜欢反复观察，每次观察都会有新发现，可谓“览察草木皆有所得”。与人相同，草木也在成长，不同的季节，草木呈现的精神气质会有所不同。比如对牵牛花的观察，就让我有了些哲学思考。清晨，牵牛花在太阳尚未升起时就开始笑脸盈盈，像运动会上期待检阅的孩子。太阳升起后，一上午它都像微缩版的葵花一样目不转睛地仰望红日。但只要正午一过，它就会马上敛起笑容，收拢自己，将敞口的喇叭缩成一截花棍，悄悄隐藏在蔓叶间不再露头。牵牛花对西坠的太阳变色如此之快，让我百

思不得其解，它是靠什么区别12点的太阳与13点的太阳？换言之，相差一个小时，阳光能有多大区别呢？但牵牛花区分得丝毫不差。我曾戴着遮阳帽，坐在马扎上观察小区里的牵牛花，小东西简直神透了，到点就收工，绝不拖泥带水，而且收工速度极快，太阳明明还在肩头挂着，小东西竟然隐身不见了。毫无疑问，对草木的喜爱是我创作《草木志》的动力所在。《草木志》最初叫《依依墟里烟》，由写炊烟入手来写乡村的变迁。写炊烟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作为柴禾的草木。乡村的炊烟之所有五色五味之分，是燃烧的草木不同所致。比如干透的柳枝，烧火做饭只有少许白烟，被初升的朝阳一照，白烟会镶上金边，发出耀眼的金色。又如干透的麦秸，在锅里燃烧时会散发出甜味，而大豆秸燃烧时不仅噼啪爆响，而且会散发出诱人的油香。用不同的柴火熬出的菜、炖出的肉，味道差别不小，有经验的村民，一口便会吃出你做饭是烧的什么柴。墟里人是不屑于烧煤的，因为煤火烧出的饭菜没有味道。这些真实的感受改变了我最初的想法，干脆写一部《草木志》吧！就这样，《依依墟里烟》变成了现在的《草木志》。

《草木志》用34种植物命名章节，这些植物都属于东北，属于大小兴安岭。34种植物各自对应一个人物，在小说中人与植物是命运关联体，他们在精神上紧密交织在一起。当然，这种关联本身也在变化，有的人由最初某种草本植物，

后来“变成”另一种木本植物，这是生活的可塑性使然。其实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，人也好，植物也罢，变化才是常态，人要把握的是变化的走向，从而趋利避害。小说中写了一个叫“老堵头”的人，他对应的植物是狗尿苔。狗尿苔是一种菌类，一般生长在树木根部。在老百姓眼里，狗尿苔是烂命一条，很贱。一般人认为狗尿苔有毒，不可食用，真实并非如此，狗尿苔的前半生是无毒的，可以放心食用，只有当它的伞盖变黑之后，才会变成有毒的菌子。而“老堵头”在进监狱前是一个任劳任怨的粮库职工，为人也不错，稀里糊涂成了罪犯后他变得不再善良，独自跑到江心岛上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，他给“石锁”出的坏主意——用滚油割碎江汉子的养殖隔离网，可谓阴险毒辣。那么，“老堵头”为什么会变成带“毒”的狗尿苔，这恰恰是应该思考的问题。我在小说中表达这样的认识，社会一旦失去公平正义，一切就会扭曲变形。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，必须让每一个乡亲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，感受到社会的公平，唯有如此，狗尿苔才会变成无毒无害的食用菌。

草木萌发，春山可望。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文学工作者，我经常思考全面振兴后的乡村应该是怎样的，是楼宇林立、厂房遍地，还是安居乐业，草木葳蕤？不得不说，我更喜欢的乡村景象是具有田园风的后者。将农村城市化，对于城市周边的村庄也许是最佳选择，但不是唯一路径。“千村千品”才对，千篇一律就有些简单化了。只有将产业、生态、文化和人才等诸要素合理摆布好，乡村功能才能健全，乡村发展才可可持续。有的地方热衷于另起炉灶，大范围异地重建，导致传承不再、村脉中断，这是不可取的。我们不妨从草木生存之道上寻找一下参照。大山绝壁上经常有崖柏、野杜鹃、兰花、不老松等植物，它们在石缝里生存极为艰难，似乎怎么长也长不大，但千百年来它们一直以自己的姿态活着，见证着四季轮回。有的人好心把它们挖回来，栽到院子或花盆里，施肥、浇水，悉心照料，结果

成活率极低。一方水土养一方草木，水土异，味不同。草木有道，道法自然，不能拿一把标尺去度量芸芸众生，万物皆有所待。因地制宜、不违自然之道，乡村全面振兴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《草木志》中的墟里是古驿站的活化石，是300年前雅克萨奏捷之路的见证者，在合村并屯大趋势下，是把它从地图上抹去，还是激活它的内生动力、让它继续活下去？这是墟里人面临的大问题，也是许许多多古村落同样面临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上级扶持政策给墟里打开了一扇别开生面的窗子。驻村干部“我”因为对这个古村的喜爱和对这个植物王国的情有独钟，开始做起“有形之事”。当然，“我”深谙“墟里的事最终要靠墟里人来解决”的道理，没有越俎代庖，而是想方设法把本村喇叭匠“哨花吹”扶持起来。“哨花吹”是个具有农民智慧的民间艺人，他不想一个300岁的古村就此终结，更不想村民们百年之后成为进了小龙山的“孤魂野鬼”，于是带领村民消弭前嫌，合力发展文旅融合产业，让墟里实现了魂体相依，恢复了郁郁葱葱的生机。

《草木志》以草木喻人，隐含着我对乡村空心化的担忧。乡村靠什么留住年轻人？年轻人在乡村如何实现自身价值？乡村的未来究竟是何种样貌，是楼宇林立、厂房遍地，还是安居乐业，草木葳蕤？作为作家，我只能通过墟里的复活提供一个参照而已。草木繁茂的墟里让人欣慰，有被“驿路遇见”文旅融合项目吸引而来的年轻人，有保护良好的森林湿地，还有原生态的驿路民俗，这种属于乡村的样貌让墟里显得更加可近、可亲、可爱。

其实，乡村与城镇是互促互进、共生共存的关系，二者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。不要总想着一方化掉另一方，和而不同，相互依存才是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道。小说中我不可能阐释政策，但我没有回避信息时代乡村应该传承什么、守护什么这个核心问题。虽然墟里人做到了，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困扰依然存在，乡村的命运和未来仍然是一篇需要用心书写的大文章。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）

今年春节前夕，我去北京拜望王蒙先生，临别获赠一本刚刚出版的《王蒙第五卷》。说实话，我期待这本书久矣，回到宾馆，便迫不及待读完了王蒙先生写的序言《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》。第二天回到青岛后，我收到王蒙先生的微信，“我的下一代批评我对老爹贬低过度，悲剧在于，他本人也完全不提不承认自己做过有意义的写作了。这值得深思回味。”

对王蒙第五卷，值得“深思回味”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客观上说，可能没有太多人熟悉这个名字。但是，相当多的人读过王蒙的小说《活动变人形》，其中主人公倪吾诚的“原型”，即是王蒙的父亲王锦第。如果站在王蒙作为儿子的立场上，便完全能理解王蒙的这种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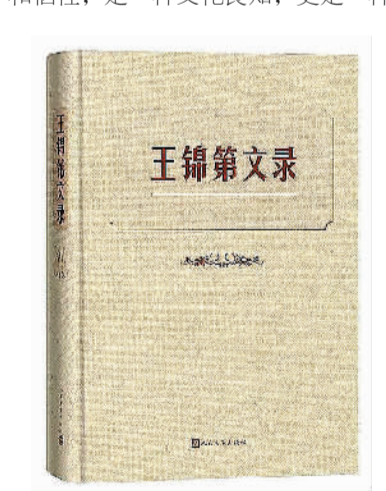
王蒙真正走进人们视野，源自王蒙自传《半生多事》，其中多处提到他。虽然用了“神经质”等字样，但是较小说《活动变人形》，王蒙读出了某种理解和同情，当然更多的是怜悯和叹息。而在《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》中，王蒙依然认为王锦第是“完全丧失了现实感的一个人物”。但是，鲧背之年的王蒙并没有忘记王锦第“由衷与慈祥的笑容”。

2008年6月上旬，我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组织了一次《王蒙自传》学术研讨会，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在发言中回忆了任继愈先生谈王蒙的一件事：“人很聪明，留过学，去过解放区，喜好清谈，但说起话来有时让人感到大而无当，不着边际。好像他的打算很多，却从未见到有什么成果出来……”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有人谈及王锦第。

同年11月9日，我曾有幸陪同王蒙先生、崔瑞芳老师去王蒙第曾任校长的青岛师范学校（时为青岛特别市市立师范学校）参观，有关部门还复印了王蒙第担任校长的“委状”给我们。“委状”中有王蒙第的照片：国字脸，阔嘴巴，圆框眼镜，西服领带，头发浓密，眉宇间流露出某种踌躇满志之意。“委状”之“备考”特别标注：王蒙第，别号“少峰”，生于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，原籍河北省南皮县龙堂村，现在住址：北京石板房二十二；现住所：青岛市太平路二号，月俸三百六十元。这可能是王蒙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翔实的个人记录了。

第一次知道王蒙第与中德学会的关系，同样源于王蒙的《半生多事》，“父亲连夜翻译德哲学著作，在《中德学志》上发表他的疮痍疙瘩的译文，挣点稿酬养家糊口。”而真正改变我对王蒙第印象的，则是几年前读到叶隽先生的长文《作为德学志的著译》。在去世近40年后，王蒙第终于渐渐走出历史的烟雾，以另一种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。

那么，王蒙第究竟是谁？“非驴非马”？“多余的人”？现代“孔乙己”？一个充满悲剧感的理想主义者？当然都对，但又太过简单。那么，王蒙第究竟是一个历史的“笑料”，还是一个背负着沉重悲剧感的历史“中间物”？这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。正视历史的代价和牺牲，是一种文化良知，更是一种



王蒙第五卷

描写，生动形象地传递出回炉师傅为了生计，希望能拉到更多客源的心理，也刻画出他的勤劳与朴实。

烟火气是一束温情的光，在鸡鸣狗吠的日常生活中闪现。《鸡鸣》一诗描写一对夫妻在深夜处理公鸡打鸣时的场景，二人对话幽默风趣，充满浓浓爱意，体现出诗人从凡俗生活中发现喜悦的能力。

优秀的诗人总是饱含一颗慈悲与怜悯之心，诗人写去医院探望病人，令人顿生温暖与感动。他对重病患者的劝慰（《希望你活着，别瞎想——赠友人》），对诗人老友、患者陶文瑜的祝福（《祝福文瑜》），对被“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”的边疆老汉的理解与同情（《不是意外》）等，表达了诗人的悲悯情怀。小海的《祝福文瑜》通过与文瑜“吸烟”的细节，传递出同情、鼓励、祝福之意，也有担忧、不舍的情感。“烟”作为日常生活交流的媒介与载体，达到了“无声胜有声”的艺术效果。

小海是站在人群中写诗的歌者，他写低处的尘埃、别处的故乡、时代深处的魂灵、世界之中的你我，并在对这些人世景物的吟唱中，展现一幅幅烟火氤氲的生活画卷，表达对世界与人类之爱。（作者系苏州大学副教授）

经历滋养了我的创作。”

据悉，从第十届“青春文学奖”起，将增设“青春文学奖·丝路青年奖”，每年设置5个名额，主要奖励在中国写作的外国留学生。获奖者还将优先获得南京市“青春文学人才计划”签约作家扶持资格和出版资助的机会。中国作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执行主任、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丁捷说：“我们的‘丝路青年奖’，正青春，经丝路，向世界。希望更多的华语青年写作者加入《青春》，成为在世界文学之都一起发光的文学‘萤火虫’。”

与专家一致认为，邹元辉创作的工业题材作品，近年来取得良好反响，形成了“工业人写工业”的鲜明特色。从创作聚焦当代中国石油化工领域创业史、改革史的长篇小说《历程》《涅槃》，到如今酝酿时

重新认识一个学者

读《王蒙第五卷》
温季桥

文化责任。

《王蒙第五卷》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作为学者、文人的王蒙第形象，全面呈现了王蒙第的学术和文学活动。客观而言，王蒙第是一个天赋高且十分敏感的学者，这一点从书中不难看出。同时，他更是一个学术兴趣非常广泛的人，对哲学、教育学、文化学、政治学、文学等均有涉猎，且见解不凡。当然，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德国近现代哲学的译介，他对斯普朗格、胡塞尔、海德格尔、雅斯贝尔斯、黑格尔、赫巴特的翻译和介绍，显示出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超拔的学术眼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善于从学术史角度，以比较视野开展研究，而不是孤零零地就事论事，有大家气象。王蒙第在北京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，学的都是哲学，特别是留学日本期间，专攻康德和黑格尔，我认为这是具有开创性的，而不仅仅是“推手”。对于王蒙第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，就如叶隽所言，应给予“重估”。此外，他对日本文化、政治、文学等的介绍，也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
然而，令我困惑的是，从学术研究看，王蒙第更像一个温和、理性的学者，而不太像他的北大同窗、著名批评家李长之所说的“‘少年维特’样的性格”。这也许是文人的多面性之一吧。

王蒙第本质上是一个启蒙主义者，这决定了他的翻译和研究不是书斋型的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，更不仅仅为了“糊口”，而是有深意指焉，有其自觉的现实考量和价值指向。他研究哲学、文化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，无不指向现实社会，指向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他的许多见解并未引起关注，甚至逐渐被历史湮没。

同时，王蒙第更是一个充满悲剧感的理想主义者。他的躁动与撕裂、焦虑与渴望，他的“上下够不着、左右都为难”，从根本上说都是个体与时代齟齬与冲突的结果。王蒙第崇拜欧美，高谈阔论，不懂实务，“不顾家”，喜欢讲英文、上饭馆，总之是个生活在现实之外的人——他的“原罪”是“脱离实际”，这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。然而，我又多少对他抱有理解和同情，毕竟，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，又有谁真正怀着理解的同情甚至悲悯的尊重认真对待过他呢？

作为中国20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种“标本”，王蒙第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王蒙第五卷》的出版，提供了一次反观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新契机和新可能。（作者单位：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）

《远航》：微观视角展现新中国工业历程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邹元辉作品研讨暨长篇小说《远航》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。

邹元辉长篇新作《远航》系其创作的“中国石化工业史诗”系列第二部作品，延续了前作《启航》的写作方式，以李阿牛等工业战线基层工作者视角，回望中国工业发展史。《远航》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，讲述了主人公李阿牛从延安调到沈阳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知识，最终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工业战线技术型领导骨干的故事。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工作生活经历，着重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的策略蓝图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邹元辉创作的工业题材作品，近年来取得良好反响，形成了“工业人写工业”的鲜明特色。从创作聚焦当代中国石油化工领域创业史、改革史的长篇小说《历程》《涅槃》，到如今酝酿时



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·桑塔格在《文字的良心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，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、部分和经验。”作为“第三代诗”代表诗人，小海的创作就具备这种品格。其诗歌在对日常生活贴近而又超越的过程中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息，表达了诗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与对生活本来样貌的思考。小海诗歌中的烟火气是醇厚的生活味道，也呈现出真实、温馨、纯洁的人情美。

小海诗歌的烟火气最先抵达的地方是家，那里有膝盖疼痛的父亲、站在窗口守望的母亲、清早买菜归来艰难地爬楼梯的岳母、“枕”着大月亮入眠的妻子，还有把羽毛球打丢了、举着球拍朝楼上喊话的女儿。这些诗歌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，表达了诗人对家人的热爱与感恩。他写母亲，写她每天都站在楼上一个固定的窗口眺望“我”归家的身影。当“我”每次恰巧到家门口时，“不用我敲门/她已为我打开家门/她做的饭菜不停地冒着热气/我的米饭和筷子/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上”。当母亲不在身边时，才发现“我”是那样地难以割舍她，“我的好妈妈不在我身边/可是我知道她在等着我/当她站在窗口的时候/这一天我就不会离开”（《想念亲人》）。

文学是人学，它只有在人间的烟火气中才能焕发出生命。小海在诗歌中展现世间百态，揭示世道人心，传递着诗人的善良与真诚，如戴着口罩“木讷的”，只露眼睛、耳朵、抱着棉被，一天到晚哼歌”的弹棉花的小哥（《弹棉花小店之歌》），期盼“再有一个顾客光临/当然更好”的修鞋匠（《鞋匠》），还有那个“年轻而又本分的常常躲避生人的麻子叔叔（《小叔》）以及那个“一边翻拣着立交桥下的垃圾筒/一边自言自语”的拾荒人（《拾荒人》）。从这些普通人身上，诗人看到生活的艰辛与不易，也感受到他们的乐观与坚强。在对世界的眷恋和对人性之美的发现中，寄予诗人的关切与美好祝愿。再如《大伙儿吃碗拉面吧——送给一户回迁家庭》，蕴含一种朴素的力量。“我和妻子/常常乘31路/我们总是碰见/那几个回族人/有一回我们碰见了/孩子/还有一回碰见了/孩子的母亲/岳母告诉我/我们这街上新开了家/兰州拉面馆。”诗人接着写听到“啪”的三声“巨响”，以为出了什么意外，结果是“只有一白衣白帽的师傅/立在店堂门口/将手上的面团/往案板上狠狠/弄这么大大动静/只为了引人注目”。诗中“立”“擀”“弄”等动作

系”。《青春》创刊初期，王蒙曾以《当你拿起笔》为题，连续多期发表创作谈，指导和鼓励青年写作者拿起手中的笔，大胆表达自我。王蒙还寄语当代青年，希望他们能在这个丰富、多元的时代更好地成长。

活动现场，获奖代表、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青年加主布哈发表感言。他说，在创作之路上，“青春文学奖”给了自己莫大的鼓励，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。“我没有剪断身上彝族语言的脐带，随着文学创作的深入，反而对那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思考。彝族村落的生活

以文学的名义致敬青春

——第九届“青春文学奖”揭晓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以“正青春 向未来”为主题的第九届“青春文学奖”在南京颁奖，来自全国高校的23名大学生获奖，王蒙获“青春文学奖·特别奖”。

第九届“青春文学奖”设“小说奖”“诗歌奖暨年度十大校园诗人奖”“散文奖”“评论奖”4个奖项。其中，殷文佳的《骑出槐阳路》、吉

克有古的《星星河或冬日》（组诗）、解言的《水生》、纪水苗的《抒情·废墟·怀旧——理解孙频近作的三个关键词》分获各奖项首奖。

本届“青春文学奖”首次设立“特别奖”，用于奖励曾在《青春》发表作品，笔耕不辍的文学大家。首个“特别奖”授予王蒙。王蒙回忆了自己和《青春》的“亲密关